

放不下的苦闷

——厨川白村创作论视域下的《弟兄》解读

张小璐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以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著作前后的生活境遇为基点,将《弟兄》置于白村创作论的框架之下进行观照。以《弟兄》产生的缘由、凸显于其中的鲁迅的生命的力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这三个维度来展示该篇小说的创作机制并由此窥探根植于鲁迅内心深处的苦闷与焦灼。

关键词:鲁迅小说;《弟兄》;厨川白村;创作论;象征手法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2-0113-04

鲁迅无疑是一位极具创造性的作家。他的美学和哲学思想的形成既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自身对于生命的独特体验,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国文学理论的影响。这从他早年推崇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以及在尼采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掙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社会文化观中可见一斑。如此谈及域外作家哲人对鲁迅的影响时,厨川白村是一个绕不开的所在。鲁迅在白村去世后,用了十九天的时间译完《苦闷的象征》。时隔三个月后,鲁迅又用了不到三十天的时间译完了白村的另一本书——《出了象牙之塔》,并大力推介两本书。鲁迅为何会同白村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呢?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了深入的探究,笔者不再赘述。但这个现象或许可以启示我们:在鲁迅的心目中,白村是他的知己,是可以和他一起“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人。从这个角度说,白村首先是在情感上慰藉着鲁迅无处安放的苦闷灵魂。同时,他对鲁迅在理性层面上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全面的,这种影响不仅停留在鲁迅更加自觉而娴熟地运用象征这一艺术手法的创作技巧层面上,而且还深入到“文本后的那个深而大的存在,那个晦明不已的精神哲学”^[1]层面上。这个“深而大的存在”在鲁迅的小说中亦早有体现,特别是在译完《出了象牙之塔》后,他所写的那几篇浸染着自身苦闷生活气息的小说(《孤独者》、《伤逝》、《弟兄》),更加鲜明地体现了白村所信奉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艺术的根柢”^[2]这一脱胎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创作论。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鲁迅以他同周作人在一起生活的细节为蓝本,以兄弟失和后的荒凉心境为基调,对自己不留情面的解剖为原则而创作的小说《弟兄》,集中实践了,或者说是呼应了白村创作论中的某些观点。这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二人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

一、《弟兄》产生的缘由：“两种力”的激烈冲突

白村的文艺观是其深刻哲思的具体体现。小说《弟兄》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对这种文艺观的实践。在白村理论的话语模式烛照下,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生命的力是高度自觉的,若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话来讲,他是十足的自为存在。他用“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很不经济的表达方式表达着他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他不愿意只做维持社会这个机关车运转的、丝毫没有检视内省意识的蒸汽力。他要做的是能够表现自己的生命和个性,与“机械的别的一部分的本质底要求,是分明取着正反对的方向的”力^[3]。如若不是这样,鲁迅尽可缓和自我和社会的紧张关系,放下“投枪匕首”,做做无关人生痛痒的“风月”文章;也尽可自沉于“酱缸文化”之中,不必去承受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如此种种,鲁迅便不再是鲁迅了。

而这样的生命的力,势必要受到社会这个大的机制的压抑。我们不妨以鲁迅创作小说《弟兄》前的境遇为基点,来感受鲁迅所受到的来自生命外部的压抑。1922年7月,《新青年》杂志休刊。这件事情对于鲁迅的打击极大。

收稿日期:2012-12-26

作者简介:张小璐(1988-),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他在此事十年之后的1932年10月所写的《〈自选集〉自序》中讲到: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3]

鲁迅对“五四退潮”这一现象总是难以释怀。他从“听将令”的战士变成了“独彷徨”的小卒,在无边的黑暗与虚无之中,他有些无所适从。与《新青年》休刊事隔一年后的1923年7月,鲁迅收到了弟弟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这不仅意味着鲁迅失掉了多年的手足情分,同时也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文学运动中的盟友与同道,因为那时,周作人已不再相信“蔷薇的梦”了。

理想和亲情大概是最易带有个性色彩和表现活跃的生命力的生命场域了,然而这个时期的鲁迅在这两个场域里都是失意的。至此,我们可以认为鲁迅的想要飞跃突进的生命力和想要兄弟怡怡、家庭和睦的内心诉求与外界的压抑的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苦闷便由此产生,而且“生活愈不肤浅,愈深,便比照着这深,生命力愈旺盛,便比照着这盛,这苦恼也不得不愈加其烈”^{[2]17}。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鲁迅将文艺作为了对生命的表现,将文艺看做是对被压抑的生命力的救赎,写下了《弟兄》。这篇小说有着鲁迅小说惯有的坚硬质地、无情讽刺、深层揭露,但是对世间虚伪的脉脉温情的批判本身就是亲情在鲁迅内心深处的折射,就是他由于理想和亲情的双重失意而引起的苦闷的象征。

二、《弟兄》的别样内涵:被启蒙话语遮蔽的本真的生命力的

因为种种原因,《弟兄》受到很多文学史著的冷落。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没有提及该篇小说;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只是把《弟兄》和《在酒楼上》合并在一起,称它们是“深沉蕴藉”^[4];在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涉及到了对张沛君的描述:

《弟兄》中的张沛君,就其生活的年代来说,可能比以上几个人晚一点,但就其精神面貌来说,却是和四铭、高尔础类似的伪善者。^[5]

这样的描述显然是作者把《弟兄》的思想意蕴置于“启蒙”这一文化场域中进行观照后得出的结论。用“启蒙”作为研究该篇小说的理论底色,批判国民伪善的这一劣根性的主题自然而然地就被挖掘了出来。这样的剖析无疑是有道理的。鲁迅和白村一样,他们都要做这个时代的“霹雳手”,但是夺目的理想之光被现实的阴霾笼罩之后,鲁迅又比白村多了几分选择走何种道路的痛苦,而此时白村则殁于关东大地震中。所以,探讨鲁迅的作品时,我们既不能忽视他思想中的颓败因素,过分地将他拔高到坚定的革命者的角色上来,同时也不能忽视他精神深处始终都存在的尼采式的怀疑和破坏。所以说,鲁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存在。在我们为他找到了一个安放精神思想的场所后,也许我们可以使审视鲁迅的目光暂时游离于他和现实传统紧张的对立关系之外,将其投向鲁迅自己的私人生活之中,毕竟“文艺是纯然的生命力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2]9}。

上述白村的观点也许唯心的色彩浓烈了些。但是,艺术作品确实多多少少都在影射作者的生活,甚至表达着很私人化的情绪。《弟兄》中的弟弟靖甫的经历像极了周作人。1917年,周作人与鲁迅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他忽然发起了高烧,鲁迅很是担心,忙请德医梯普尔来诊治,才知道是出了疹子。这些兄弟俩生活中的情节和“这篇小说中含有的讽刺的成分少,而抒情的成分多”^[6]这样的阅读体会,都足以帮助我们规避启蒙和批判的话语。吴俊在其著作《鲁迅个性心理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小说的主人公张沛君的心理自剖,也使我终于不能不怀疑他所具有的鲁迅自身的独特的心理内涵:其中是否也泄漏了鲁迅内心深处的某种阴暗因素呢?当然,这种阴暗因素就是指他的负罪意识。”^[7]我们不妨沿着吴俊打破现实和小说界限这一解读鲁迅自身和其小说的思维模式,以张沛君这个人物形象为切入点,透过鲁迅思想的缝隙,来审视他思想中偶尔脱离了传统道德束缚的部分。这个部分与其说成是代表着鲁迅内心中的“阴暗因素”,不如说成是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体性原则与建立在群体多数之上的道德准则的不相容的所在。进一步说,正是这些“阴暗因素”表现出了鲁迅暂时脱离了社会束缚进而显现出的本真的生命力的。

成长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鲁迅,重视孝悌亲情。特别是家道中落后,他更是以长子的身份来照顾母亲和弟弟。年少时,他撕毁弟弟周作人的风筝,又何尝不是出于“长者本位”的心态呢?这与他成年后反对封建孝悌观念似乎形成了一个思想上的裂缝。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与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反对传统文化时所经历的阵痛。

但是不管这条裂缝如何存在,也不管鲁迅是出于“长者本位”还是出于自然天性,他对于弟弟周作人的关心爱护是真实存在的。他曾中断在日本的研究工作回国以资助弟弟;也曾购置八道湾的住房有过永不分家的计划;还曾送过周作人一本改变了其思想轨迹的书——《天演论》。可以说,鲁迅在周作人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了兄长。但是在回忆起这位兄长的时候,周作人却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事实上他也对我曾经说过,在重病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的妻子的事。’”^[8]鲁迅此刻的态度与张沛君如出一辙——沛君担心弟弟的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抚养弟弟的儿子荷生。但是,在弟弟生病前,兄弟俩确实也没有为钱计较过。从这一点上看,也不能不算“兄弟怡怡”。

鲁迅为什么会有同张沛君同样的想法?难道他们以前所表达的对弟弟的关爱都是虚伪的温情之举?此处,鲁迅内心深处的这个声音恰是他的本真的生命的力的体现。他在某种程度上揭下了蒙在“梯”上的多少有些虚伪的面纱,表现出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生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利己主义。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周作人,正如沛君也并非不关心弟弟靖甫一样。兄弟的绝交对鲁迅来说是一生的伤痛。但是正如周作人所说:“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的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着神——即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9]鲁迅的生命的力就是在这个“是人而非神”的前提下,摆脱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强调群体家族而忽视个人这一不合理的逻辑的枷锁,而实现了飞跃的。人格独立、自由意志这些能够代表一个人生命的力的要素往往会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兄弟之情所压抑。“名和利都可以让给兄弟”^[10]的鲁迅总有不能让与的东西,总有利己的那一面存在。鲁迅自己在《摩罗诗力说》中也说过:“即一切人,若去其面具,诚心以思,有纯禀世所谓善性而无恶分者,果几何人?”^[11]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就算鲁迅借沛君这个形象所表达出的内心的想法是有违道德的,但是我们从中亦可看出鲁迅真实的生命的力,与美丑无关,与高尚与否无关,只与是否摆脱了压抑进而显现出了生命的本真有关。此外,鲁迅能够自觉地审视建立在人人都具有先验的善良本心这一人性论基础上的“反身而成”的真诚观,大胆地指出虚伪的人性面具和自由的灵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用他的桀骜活跃的生命力颠覆了被传统所认同的至诚的“仁义道德”。这或许可以视为以《弟兄》为具象进而超越了该篇小说之外的鲁迅的本真的生命的力的另一种体现。

三、《弟兄》的艺术技巧:象征手法的双重运用

白村认为,古往今来的一切文艺都是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即作者的抽象的思想“经了具象底的人物、事件、风景之类的活的东西而被表现的时候”^[23],就完成了艺术的最大要件——具象性,文艺也因此而形成。由此观之,白村认为象征是在其本体意义上构成了文艺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说是将人生苦闷转换成能够被外界感知的文艺的桥梁。《弟兄》中出现的主人公、医生、办公室等具体的人物和场所、小说的情节就是这样的桥梁。只是它们不用怎么“打扮改装”,它们本身就与周氏兄弟的生活极其相似,或者说,这篇小说就是鲁迅选择的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片段,用来展现对自身灵魂的追问和对兄弟昔日情分的怀念。小说的结局处出现的男性死尸,正是靖甫的象征性替代。沛君从同事那里抢过公文,争着要处理这件事情。同事让步后,沛君的神态是安心而沉静的。此处的象征显然不是在折射鲁迅的生活经历,而是在将鲁迅矛盾抽象的内心世界具象化。真诚和虚伪博弈的结果是真诚获胜。就算靖甫病死,沛君也会料理他的身后事并照料他的家庭。正如邓晓芒在《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书中所言:“真正的真诚是在意识到这种真诚有可能是虚伪时才产生的,是对自己的真诚永不满足和随时拷问。”^[12]至此,我们可以相信沛君在经历了直面虚伪的自己之后,所表现出的是经过自我检视的真诚。一场虚惊过后,靖甫并未察觉哥哥内心深处利己的想法,他们依然可以“兄弟怡怡”。但是,周作人和鲁迅的决裂却是无法挽回的。两相对比之下,《弟兄》中的悲剧意蕴便凸显在了启蒙与批判的话语之上,它更应该被看做是对伏藏在鲁迅潜意识里的苦闷,即精神的创伤的一种象征化的表达。《弟兄》这一小说题目中所蕴含的反讽意味也似乎因此减弱了许多。这便是该篇小说在广义上所体现出的对象征手法的运用。

《弟兄》对象征手法的另一重自觉实践体现在小说中对张沛君的梦境的描写上:他在弟弟死后,为弟弟收殓尸体的时候,受到了左邻右舍的称赞;他不准弟弟的儿子荷生去上学并扬手打得他满面是血,此时,面对周围人们的指责,他又胆怯了,劝人们不要听信孩子的谎话,然后伸手又要打荷生……张沛君的内心欲望便是不愿抚养靖甫的儿子以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这个欲望平时受到了伦理道德的规范,公益局同事对兄弟二人感情之深厚的赞扬也变相地成为了抑制这种欲望的力。然而“如果说这欲望的力免去了监督的压抑,以绝对的自由而表现的唯一的时

候就是梦”^[24]。由此观之,张沛君只有在梦中才能将这生命的力释放出来。我们仔细地审视了这个梦以后,不难发现,即使在梦中,张沛君依然要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压抑。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鲁迅内心沉重的悲哀。他深深地挖掘着自己的内心,在生命的力和外界给予他的压抑的力之间徘徊,即使在梦中也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大苦闷成就大文艺,似乎在这个意义上的理解才能落到实处。描写梦境,是鲁迅在《弟兄》中自觉运用象征手法的另一重体现。

四、结语

鲁迅认为厨川白村的文艺观是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22]的。这句评价不仅可以看做是鲁迅对白村的褒奖,更应该看做是鲁迅将白村视为精神知己的证明。事实上,他在系统地接触白村的文艺观之前所创作的小说中就蕴含着许多与白村相似的创作观点。例如在《故乡》和《祝福》中,鲁迅着意刻画的那个和周围的环境极其不相容的叙述者“我”的形象。之所以不相容的根本原因是,“我”的生命的力中的一部分已经觉醒,已经认识到了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有着要与社会的力背向而驰的倾向,尽管这种倾向被压制、被扼杀。此外,还有对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同白村一样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狂人日记》便是典型的代表。这篇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意象和整篇小说表现出的浓烈的象征色彩甚至使得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篇象征主义而非写实主义的小说。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白村的创作观影响了鲁迅的小说创作,不如说是他的创作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鲁迅小说创作规律的归纳和总结。这一点在《弟兄》之中体现得尤为鲜明。这篇小说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不再是痛快淋漓地批判虚伪人情之后的快感,也不再是基于小说的题目而产生的审美期待最终落空后的失落,而是瞥见了偶然逸出传统道德伦理束缚的生命的力之后所产生的陌生感和惊讶感。此时,我们在《弟兄》中感受到的张力不仅仅是沛君在弟弟生病前和生病时的矛盾表现,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于社会的力和想要摆脱其压抑的生命的力之间的纠葛冲突。文艺,或者说文学作品,按照白村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张力之下产生的。

参考文献:

- [1]孙 郁.关注鲁迅与东亚的起点[N].文艺报,2005-12-20(03).
- [2]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 [3]鲁迅.《自选集》自序[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9.
- [4]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新一版·上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46.
- [5]林志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76.
- [6]许寿裳.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1223.
- [7]吴 俊.鲁迅个性心理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7.
- [8]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鲁迅回忆录:中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56.
- [9]蹇小兰.周作人的清风苦雨[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212.
- [10]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关于《弟兄》[M]//鲁迅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82.
- [11]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4.
- [12]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24.

Unforgettable Anguishment

—Lu Xun's Novel *Brothers* under Hakuson Kuriyagawa's Creation Theory

Zhang Xiaol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ase on Lu Xun's life situation, and put *Brothers* in Hakuson Kuriyagawa's creation theory framework. According to these, the author is trying to know the creation mechanism of this novel, to highlight Lu Xun's life force and to explore the way of using symbolism in the novel. These three dimension will help us to know the novel creation mechanism and thus to spy out rooted in Lu Xun's inner anguish deeply.

Key words: Lu Xun's novels; *Brothers*; Hakuson Kuriyagawa; creation theory; symbolism

(责任编辑 王 作)